

手机的人类学研究——以中国东北地区都市社区为例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州，510275） 姬广绪

【摘要】 本文基于笔者 2008 年 9—10 月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对中国东北地区辽宁省沈阳市的一个中低收入社区居民使用手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笔者对社区中使用手机的居民进行了阶段性的分层研究，试图展示给读者一个社区总体性的手机发展图景。同时笔者在调查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了居民在相对贫困的状况下如何发展出一套“本土化”的手机使用策略。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work during the September and October in 2008, the author investigate the mobile phone use pattern in a urban community which located in the Shenyang city of Liaoning province in northeast of China. The article show the reader a general sce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 use pattern through the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mong the citizens living in the community. Meanwhile the author also put focus on the “domestication of technologies”, which is promot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poverty in an urban city.

【关键词】 手机 贫困 技术本土化 策略

【KEY WORD】 Mobile Phone Poverty Domestication of Technologies Strategy

中国是世界上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据国家信息产业部的统计，截止 2008 年 7 月，中国手机用户数达到了 60837.8 万户，同比 2007 年底增加了 6107.3 万户。而且中国同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一样，例如印度，牙买加等发展中国家，手机以一种异于寻常的速度迅速普及。中国在 1991 年手机用户数仅仅 4.75 万户，而到了 1999 年，用户数就迅速增长为 4330 万，仅 2000 年一年，手机用户就增长了近一倍，达到了 8453 万户。^①这样一种惊人的速度提醒我们在关注手机用户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http://www.miit.gov.cn/>。

数增长的同时，也要对于手机的普及所带来的影响极其同改变居民的生活状况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加倍关注。同时，我们也要对于手机这种新的通讯科技的“技术本土化”（Ling 2004）给予足够的关注，发掘不同的地区在使用这种通讯工具时的使用模式。

现在全球存在这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手机用户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固定有线电话的用户数。仅从中国的调查数据来看，截止 2008 年 7 月，全国固定电话用户数为 35505.6 万户，同比 2007 年底减少了 1058.1 万户。^①而同时期全国手机用户数已经达到了固定电话用户数的将近两倍，而且新增用户数还在以惊人的速度递增。在我们对都市居民的手机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非都市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这些地区并没有固定电话。而由于手机的廉价和手机信号接收塔的设立，给这些地区带来了使用手机作为主要通讯手段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及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度，手机用户数却远远高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但是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这样的新型通讯技术是以怎样的方式在影响着我们的世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无论是好是坏，无论是穷是富。

伴随着中国的手机用户的迅速增长，尤其是笔者所调查的社区居民手机用户数的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手机是否会如同电话一样，在上个世纪发明并在普及的过程中出现“数字鸿沟”问题。据笔者对于田野社区的调查，该社区中目前几乎每户家庭中都至少有一部手机，围绕着如此高的普及率就带来一个问题，手机这种新型通讯技术到底会不会拉大贫富差距。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地下结论，因为随着科技的向前发展，会有新的问题继续涌现出来。2005 年的《经济学家》杂志预测，手机即将超越互联网成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关键技术。（Heather 2006）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内地东北地区一个省会城市中的中低收入社区内居民使用手机的情况，廓清手机这种信息沟通技术对于社区居民的影响。对于笔者所调查的社区来说，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该社区代表了东北这个曾经的“共和国长子”在经历了一场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关、停、并、转”改革之后该地区多数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中低收入水平应该说是辽宁省乃至整个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http://www.miit.gov.cn/>。

东北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的关键词，也是东北地区在整个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

贫困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造成贫困的原因也各有不同，笔者在此次研究中也并不奢望建构出一个具有全球普同性的框架，只是希望可以根据田野点中所搜集到的材料来梳理清楚造成该社区居民普遍生活水平较差的原因，并试着去分析新型通讯技术——手机在消除贫困中的特殊作用。人类学的传统是借由长时期的田野调查，运用田野材料、民族志对于人类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而现在笔者所进行的显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笔者希望借助例如长期田野民族志这样的人类学方法来解决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学术研究。

一、国内外手机研究现状

手机作为新型的通讯技术出现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真正作为商业产品普及到民众生活中也只不过 20 多年的历史。美国的商业手机最初开始面世是在 1983 年，中国就相对更加晚一些。目前关于手机的人类学研究还不多见，主要的成果都在西方学术界。Fischer(1992)和 ling(2004)的关于电话和手机的研究应该算是很有影响的，Fischer 在他的书中提出了一个看法，那就是“电话并没有特别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相反美国人用它来积极地发展自己有个性的生活方式”。Miller 和 Slater(2000)的关于特立尼达岛的互联网研究提出了一个“延伸实现”的概念，是说在互联网应用中岛民并没有去追求那些新科技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而是首先去实现那些历史上由于科技的限制而没有实现的需求。同时，在关于手机的研究中，ling 提出了一个“技术本土化”的概念，以避免所谓的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早期的关于手机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那些固定电话已经高度普及的都市，在这些地方，关于手机的研究主要是将其作为“移动电话”来研究，也就是移动性和个体性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早期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2006 年，Heather A. Horst 和 Daniel Miller 合著了一本《The Cell Phone: An Anthropology of Communication》，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志，而目前国内对于手机的人类学研究至今笔者还未能见到。在国内对于手机的关注主要是社会学、通讯工程、传播学等学科，主要的关注点是手机文化、手机使用人群的分层研究、手机媒体研究等等。可以说西方学者对于手机以及与其相关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比较细化的程度。国内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相比，国内学者对于手机的研究还多停留于通讯技术层面，对于手机文化、手机与社会、手机与家庭

的关系研究还鲜见。

本研究的主要着力点是评估中低收入社区居民的移动通信生态状况，因此在前期的调查中并没有以牺牲手机作为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主要的通讯工具这样的维度来绝对划分手机的移动性和个体性之间的差异。笔者主要考虑的还是手机作为社区居民之间一种价值和实践的日常沟通的基本属性。在经过了两个月的前期调查后，笔者发现手机在社区居民的日常沟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手机的使用维持并且加强了使用者的社会联系，而并没有像其他人所想像的，手机所带来的个体性的增强会削弱居民之间的面对面的沟通，手机的使用并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面对面的沟通。在笔者调查过程中，经常会发现很多的居民晚饭后就会聚到楼下的小卖店闲聊，而更有趣的是有些人还会通过“flashing”的方式用手机来呼朋引伴，召集平日经常在一起聊天、打牌的同伴到楼下来。这就说明了手机的使用客观上加强了居民之间面对面沟通的方式。

二、田野点社区结构和交流模式

笔者的田野点——胜利社区原本是棚户区改造的回迁小区，社区中最初的居民都是时代生活在此的所谓的“坐地户”。该社区居民于1998年回迁，至今已有十年的时间。该社区形成之初也是由过去的几大棚户区以及厂矿职工宿舍合并而成，10年间形成了一个新的社区聚落。据小区的居民介绍，回迁之初邻里之间并不完全认识，有一些原本就是过去棚户区时代的老邻居，自然相处比较融洽，走动也相对频繁。而那些其他的棚户区和职工宿舍的居民，他们并不认识。因此回迁之初，居民之间的交往对象和交际半径还是以动迁之间的社会交往半径为边界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本身都市社区的家户空间布局特点等因素的影响，社区居民个体和家户的交往对象和模式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可能原来很熟络的老邻居，由于不在同一栋楼或者相隔几栋楼，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可能不再联络了。而那些本来不认识的近邻，由于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慢慢就被纳入到居民的交往半径中了。由此我们可以仅从胜利社区的居民日常交往半径的变化来看出该社区居民经历了一个新一轮的自我和群体认同的过程。

胜利社区位于皇姑区的中心地带，周围分布着几个商业圈，西塔商业街，长江街商业街都散布在其周围。由于这样的原因，外地来沈打工人员在胜利社区租房子的比较多。同时由于该社区本来就是动迁回迁楼，并不是高档住宅小区，

相对租金比较便宜，因此很多的打工人员都选择在此租房谋生。另外该小区自1998年回迁也已有10年时间，这期间也有很多的居民搬出了这个小区，同时也有很多的原本并不是此小区的“坐地户”^①陆续搬了进来。由此按照当地社区居民的说法，现在胜利社区的几大人群众包括“坐地户”，即所谓的回迁后就一直居住在此的居民，另外就是中途购房搬进此小区的居民，还有就是租房者。这三大人群构成了胜利社区主要的人口结构。

沟通对象：按照社区“坐地户”居民的说法，现在这三大人群虽说在同一个小区内生活，但是各个人群之间的来往是有区别的。这样的区别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交往模式。按照一些“坐地户”的说法，他们主要的交际对象主要就是原来棚户区时代的老邻居，现在的邻居，以及一些在这10年中陆续结识的社区中的居民。这个人群对于其他两个人群在交际模式上区别对待。举例来说，我的一个报道人就是本社区的“坐地户”，她在社区中通常来往的对象包括原来棚户区的老邻居，还有就是现在楼上楼下的邻居，再有就是几个平时谈得来的、被她称为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的人”的后搬来的新邻居。再问道她是否同租房子的那些人打交道时，她说她几乎没有和那些租房子的人打过任何交道，即便是住在自己家对面的那一户。

沟通方式：经过观察和访谈后，我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在我调查的社区中，家庭之间互通电话的比例相当低。每户都是关起门过日子，邻里之间的人际沟通和往来往往有着相对固定的群体。而且按照不同的标准形成了相对的小群体。

在我观察的范围内就有几个类型。一种就是老年群体，这个群体中又按照性别和互动形式有所区分。社区中老年妇女群体占据了邻里沟通很大的比例。这些老年人往往聚到一起聊天，或者结伴去买菜，聊天的主要话题就是健康状况、子女情况。还有一些老年男子群体，他们聚到一起经常谈论所谓的“国家大事”，品头论足历届国家领导人，回味当年自己的人生。除了这些以外，这些老哥们儿聚到一起主要就是下象棋，消磨时间。而另外一种老年人互动的形式就是“纸牌”，通过这种休闲来完成日常的互动，增进了解。

另外，中年赋闲在家的男子也形成了另外一种互动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在社

^① “坐地户”为地方化语言，意思是生在此地，长在此地，长期生活在此地的居民。

区中占据不同的空间，有些是在一些小卖店门前，这些人无论白天、傍晚都在这里“臭白话”、“侃大山”，当然谈话的话题也自然山南海北，不过现阶段最为热门的话题当然就是刚刚闭幕的北京奥运会，大家聚到一起谈论着每个运动员的表现，运动员的身家背景，包括一些“独家消息”。这些人都是努力地去找到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消息来树立自己在这个群体中的优越感，努力地参与任何的话题，以证明自己的学识渊博、见过世面，而不是大家通常所认为的“土包子”。当然这些中年男子聚到一起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打麻将、打扑克，虽说算不上赌博，但是有些时候一天也要差不多几十块的输赢。这些聚众玩牌的男子被社区中的其他的人认为不务正业，整天游手好闲，往往也受到其他群体的排斥。

同样也有一些中年女子的小群体存在于社区中，这些所谓的家庭妇女，通常是一些结了婚、生了孩子，孩子目前在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女人，她们通常据到一起谈论的是柴米油盐、家庭琐事。例如哪家超市又在打折，最近豆油又在涨价，哪家的女儿生了儿子，谁家的老公丢了工作等等。因为现在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所有家长都关心的问题，而且每次当我和她们聊天时，因为我的身份，她们谈论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如何教育好自己的孩子的问题。其中包括学费减免问题、孩子课后辅导班问题、高三及初三的孩子的考前准备问题等等。我可以从中感觉到在这样一个大部分的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社区，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子女身上，这其中也包括和我同龄的那些新婚妈妈，她们都希望竭尽全力给孩子创造出最好的学习条件，希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摆脱父辈的命运。

在我的一个重点报道人家里，儿子明年就要参加高考，现在在市里一所省级重点学校读书，夫妻两人把每个月大部分的收入都拿出来给孩子读书，孩子现在是要什么买什么。阿姨说现在的孩子在学校攀比之风特别严重，儿子经常回来要这要那，今天要一个彩屏电子词典，明天要一个运动水壶，后天又看同学买了彩屏手机，回来也嘟囔着要买。阿姨说今年是最关键的一年，考不考得上重点大学“就在这一哆嗦”，因此她说家里现在给他排除了一切干扰，要什么买什么，唯独不能买的就是手机。阿姨说这玩意儿太耽误学习，就这样现在有时候孩子还用老爸的手机给同学发短信。因此家里坚决不同意给儿子买手机。阿姨说孩子考上了如意的大学就肯定给他买一个好手机。

在胜利社区中，我发现每一个小的群体之间的分立都比较严格，界限明显，

内部的排他性较强。因此出现了各个小群体之间的居民几乎不怎么往来。而且有几个小群体是把社区的小卖店作为“根据地”，因此每个小卖店的消费人群也相对固定。一旦有另外一个群体或者其他的住宅楼的居民来买东西，彼此都会觉得很习惯。举例来说，我的一个报道人家里就开了一个小卖店，这个小卖店的消费人群主要集中在其所在的 15 号楼以及对面的 14 号楼的 3、4、5 单元。因为 14 号楼一单元也开有两家小卖店。对于这些经常来光顾的居民来说想要融入这个小群体是比较容易的，小卖点的女主人孙阿姨人比较随和，又很善谈，每次有居民光顾她都会主动和人攀谈几句，久而久之，这些居民就和阿姨比较熟络，夏天的晚上，他们就会来到小卖店门前乘凉、聊天。而小卖店的男主人也很热情，他自己用废木料做了很多的小板凳给晚上来乘凉的居民坐，因此大家都喜欢到这里来。同时经常来闲聊的女人，偶尔也会带着老公孩子一块来，时间一长这些男人就在小卖店门口支起了“一局扑克”。小卖店的男主人石叔叔免费给大伙提供扑克、日光灯，久而久之到这里乘凉、聊天的人越聚越多，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小区中比较稳定的一个小群体聚落了。

社区中的居民在各自不同的群体聚落中互动着、交流着，完成了群体的认同。这些群体的成员互相交流着信息、分享着经验。由此这样的群体凝聚力越来越强，由此形成的排他性也越来越强。

在这样的面对面互动占据主要互动形式的社区中，手机和电话的进入并没有对社区居民之间的人际沟通带来巨大的影响。

三、胜利社区居民使用手机模式

1、人群分层

按照不同的参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可以把同一人群分成多种不同的亚群，例如年龄、性别、职业等参数。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都市社区中居民使用手机的模式，因此在对人群进行分类的时候主要的参照指标就是手机。如果按照这样的参数来进行人群分层，首先就可以分成使用手机居民和非使用手机居民。非手机使用者尽管也是笔者观察、调查的一个人群，但是笔者主要的关注点还是放到了社区居民中使用手机的这部分人群。接下来将使用手机的群体进行进一步的细分，根据笔者在田野中获得的材料，社区的使用手机人群按照性别、年龄、手机类型的参照系被划分。但是同样在调查过程中，即便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

人群划分，各个参照系数还是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比如首先按照性别参数，我们可以将手机使用者分成男性使用者和女性使用者。根据笔者的调查来看，胜利社区中男性手机使用者明显多于女性。但是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即便是按照性别进行分类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女性使用者中，年轻女性的手机使用者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中年和老年女性。因此在进行人群分层分析的前期，笔者首先对社区居民使用手机的类型进行了分析，也就是通常居民所说的“手机”和“小灵通”。而且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通过不同的人群在使用手机进行通讯交流的策略这个层面，我们可以很好地诠释出之前提到的胜利社区所处的“中低收入”的状态。为了理解方便，首先交代“小灵通”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手机的关系是必要的。

“小灵通”无线市话（Personal access System）简称 PAS，是一种新型的个人无线接入系统。它采用先进的微蜂窝技术，通过微蜂窝基站实现无线覆盖，将用户端（即无线市话手机）以无线的方式接入本地电话网，使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电话不再固定在某个位置，可在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内自由移动使用，随时随地接听、拨打本地和国内、国际电话。此外，导致社区许多居民选择小灵通作为移动通讯工具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它的一项优惠措施，也就是“亲情 1+”。“亲情 1+”是中国网通为家庭客户提供的、满足多业务需求的家庭通信综合服务产品。它全面涵盖了固定电话、小灵通、宽带及多种增值业务，目前主要包括“亲情无限”（固话+小灵通+宽带）、“亲情随身”（固话+小灵通）、“亲情在线”（固话+宽带）三种组合产品。各组合产品由基础业务包和附加业务包构成，其中，基础业务包由固定电话、小灵通、宽带等基本接入业务组成，限额包月中含有一定本地通话时长或上网时长；附加业务包由同号、悦铃、来显等增值业务及一家亲、亲情号码、长途优惠包等优惠业务组成，附加包业务可根据客户自身需要自主选择。

“亲情 1+”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固定电话、小灵通组合产品无月租，共享时长，共享话费。而且大部分的市民选择使用小灵通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与固定电话实现了“捆绑”，完成了笔者在后文要提到的所谓的“手机座机化”的过程。

从群体上来看，第一部分使用这种小灵通的人群是退休了赋闲在家的中老年

人。他们平日里没有工作，生活相对单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三点一线：家——菜市场——楼下。也就是说这些人平时主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家人、买菜做饭、聊天侃大山。而他们之所以使用手机主要原因一是网通公司推出了这项优惠的政策，他们可以以固定电话的资费标准来实现通常情况下相对高的通话费才能完成的移动通讯；第二就是现在小灵通的价格相对便宜，因为多数小灵通手机功能相对单一，主要功能就是接打电话、收发短信，有个别机型支持手机上网。自然就造就了小灵通相对低廉的价格，这也就使得本来很高的移动通讯门槛降低了许多，手机也就不再是有钱人的玩意儿了。再有，调查中笔者发现这部分退休中老年人的子女普遍都已经或结婚或参加工作，他们已经没有了太多的经济的负担，相比社区中一些有子女上学读书的家庭来说经济条件相对宽裕，因此他们也有经济能力使用手机。而且据笔者的调查走访了解到，这些人中有一部人的手机是儿女买给他们的。子女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证自己不在老人身边时可以随时随地联系到他们，了解到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而且他们想一旦老人在外面出了什么状况，旁观者可以借助手机里的号码及时与家人或亲属取得联系，防止出现不必要的意外。

另外一部分使用小灵通的群体据笔者观察就是下岗后在外打零工的社区居民。这部分在外打零工的居民有很多原来是国有或集体企业的职工，计划经济解体后他们便从单位下岗，被推入了残酷的就业市场。这部分人普遍年龄偏大，不具备市场需要的劳动技能，因此他们大部分只能从是一些相对脏、累、差的工作。由于他们的工作多数是临时雇佣性质的，因此保持同有就业渠道的朋友或者雇主的联系就成为了他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一位在外从事保洁，给人家擦玻璃的阿姨告诉我，每个打工的人必须有手机，这样的话一旦有人需要擦玻璃，雇主会立刻同你取得联系，你就会得到这个机会，赚几十块钱。否则人家就会打电话找别人了，而且长期久而久之人家就根本不找你了，你的临时饭碗也砸了。因此移动通讯对于这部分社区群体显得至关重要。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部分的群体家庭经济条件普遍相对较差，家中多数是有上学的适龄子女，要么是有上了年纪的老人需要照顾。

2、使用目的分层

从上述的社区居民使用手机的情况可以总结出，居民使用手机主要是为了满

足三方面的需求：安全（security）、沟通（coordination）、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Ling 2002)

按照群体分层，这三方面的需求分别对应三个相对人群，当然每个人群都可能对三个需求有交叉的状况出现。比如即便是青少年群体也可能除了可接近性的需求之外也有沟通和安全方面的需求。但是我们主要是从群体总体相对明显的需求特征来进行界定。

从笔者对社区的调查来看，中老年群体对于安全的需求明显多于其他的两种需求，这点我们可以从老年人购买手机和使用手机的动机及模式中都可以看出来，不再赘述。而社区中的具有固定工作和临时工作的居民使用手机则主要是为了满足沟通需求，这点尤其在从事临时工作的居民中更加明显。对于他们来说安全和可接近性并不是非常重要，他们最主要看重的就是信息沟通，因此他们对于手机的外形和功能是否强大并不特别在意。在对他们的访谈和问卷中，笔者发现，他们对于手机的要求只有两方面，一方面从手机来讲，质量越好、待机时间越长越好，当然手机购买时的价格也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根据笔者的调查，这部分群体中有一部分居民的手机是通过亲友馈赠或者子女淘汰获得的。另一方面从手机消费来讲，他们总是希望手机主叫费用越低越好，尤其是对于月租费更是希望能够取消。这也印证了小灵通在此社区中拥有着广大的用户的现象。小灵通刚好就满足了这部分的群体对于沟通的需求。

3、胜利社区居民手机使用策略

根据上述的手机使用人群分层和手机类型分层，再围绕着“中低收入”这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总结出胜利社区居民使用手机的两大策略——“手机座机化”和“接听模式”。

“接听模式”可以说是胜利社区居民使用手机的一个策略。在笔者前期进行的 100 份抽样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到“平时打电话多一些还是接电话多一些”时，有 22 人选择了打电话，70 人选择了接电话，8 人选择了打电话、接电话差不多一样。而即便是这 22 个选择打电话多一些的问卷中，我们又发现这些被访人中有一些是个体做买卖的，有一些是“小灵通”使用者，另外还有家中没有固定电话的。同时在问卷中的另一个指标也可以反映出居民对于“接听模式”的运用。在问卷中问到了居民在选择手机卡时哪些因素是优先考虑的，在 100 份回收

的问卷中，“月租费”、“主叫便宜”以及“被叫免费”成了居民最为关心的三大要素。而在我进行访谈时，多数居民对于手机卡的资费是否“合适”进行衡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接听是否免费。很多居民在和我聊天时都询问我现在市场上何种卡型资费合适，在我跟他们介绍了某一种后，他们紧接着就会问：“接电话要钱不？”由此可见，“接听模式”已经成为社区居民使用手机时一个重要的策略选择。由此我们也可以将其看成是手机这种新型通讯技术在胜利社区“本土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

“手机座机化”指的就是上述提到的社区居民对于小灵通这中移动通讯工具的青睞所导致的一个现象。同时它也是同上述提到的“接听模式”相关联的。在中国，手机同固定电话的差别在寻常百姓看来不仅仅是“可移动”，同时双向收费制度的存在也阻碍了手机早期在中国的普及。在调查中，多数居民的手机都是在2000年以后购买的，还有一大部分居民的手机都是近三年内购买的。他们说之所以以前不购买手机，不仅仅是手机价格昂贵，同时高额的话费也使他们望“机”兴叹。在访谈中多数使用手机的居民，尤其是平时打电话不多的居民对于手机的双向收费意见很大，而在问卷中，他们在表达对于未来手机发展的期望时，“单向收费”、“取消月租”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焦点。

从上述两个“本土化”策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国家同商业的共谋导致了手机资费标准的变化，由此导致了手机通话费用的降低，这样的政策推动了手机在中国的普及，而手机的普及所带来的就是“科技本土化”程度的加深。因此我们可以仅从胜利社区居民手机使用的模式管窥中国移动通讯的发展历程。

4、社区青少年使用手机模式

人类学中对于青少年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多数人类学家——例如盖纳普（Gennep）和特纳等人对于过渡仪式和阈限的研究——都将青少年这个阶段作为一个相对不稳定的阶段，这个阶段标示着一个青年人完成社会化的转变过程。多数的人类学研究多关注体质上的成熟和转变，而对于这个阶段的青少年的“成人化”过程疏于关注。因此本研究刚好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弥补这个空白，笔者从青少年对于手机的使用和使用过程中的特质进行分析，由此揭示这个所谓的“过渡性”的群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性。（Ling 2002）

在中国的城镇地区，人们对于什么是成年人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找

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养家糊口了就是成年了；有些人认为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才能成为一个成年人；还有一些人认为高中毕业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了就成为成年人了。在中国这样的高速发展的社会，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对于成年人进行界定的标准。按照笔者的分析，这其中包括着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外界的因素，在当今的都市地区，我们很难看到所谓的成年人的仪式，而都市地区的孩子自打进入这个社会，他的所有的生活都已经被近乎制度化地安排好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在他们的人生中几乎从来没有时间停下来，按照笔者调查的当地人的说法，这么“一溜烟”的顺序下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多数人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当然都市中的人对于什么是“成年人”无暇关注。除了上述的外界因素之外，每个个体对于“成年”的自我感觉、自我认同也是不同的。由此也就出现了当下流行的“早熟”现象。这其实就是外界对于成年的定义和标准同个体感受之间发生了冲突，导致了一个认同的误差所致。

无论是结婚生子或是大学毕业谓之成年，我们都可以发现中学阶段，即 13—18 岁通常是一个人性格型塑、知识疯长、社会化程度日益增强的重要阶段。在笔者对所调查社区的居民进行调查的时候，多数的居民都表示无论是自己的孩子还是社区中的其他家庭的孩子，初中和高中阶段都是“最长出息”的阶段。

孙阿姨：我就天天在俺小区看，孩子啊，最出息的就是上中学的时候。你说他们上小学的时候啥也不懂，一天就知道疯跑，上了中学以后，个也长高了，也不像小学时候那么淘了。要是有一段时间没看着，过一段再看那孩子就出息了不少。

对于调查社区青少年使用手机的情况，我重点选择的就 13—18 岁正在读初中和高中的中学生，从他们使用手机和拥有手机的情况来看他们如何在此阶段逐步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并同时评估手机在这个社会化过程所扮演的角色。

在了解青少年使用手机的模式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个群体使用手机的背景，而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考虑手机使用的经济因素。目前中国手机卡消费采用的主要是预付卡方式，用户须在使用前先向手机卡中预存一定的话费，这样

做的目的是避免恶意欠费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目前中国移动通讯市场上的手机卡除了一些卡型需要支付手机卡费用外，大部分的手机卡都是开卡即免费赠送的方式。这样的政策和消费方式从一定的程度上给青少年使用手机创造了便利的条件。由于目前中国手机通讯市场上手机卡的价格、通话费用和信息通讯的费用相对低，青少年获得移动通讯的可能性也就更加高。

青少年本身存在的经济非独立性和行为的受限制性导致了他们必须对于手机使用采取节约的方法。他们必须根据自身可支配的“收入”来调整使用手机这种对于他们来说还是相对昂贵的经济行为。因此短信在这个青少年群体中的兴起就应该说是适应了他们的本身的经济条件的。由于短信是按照发送量来计算费用，而且每条短信的通信费用相对于通话费用要低一些，因此收到了青少年群体的广泛接受。在笔者对于小区中的几个拥有手机和使用手机的中学生的访谈中，他们都表示相对于通话来说，他们更青睐通过短信同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取得联系。

“发短信便宜啊，一条才一毛钱。打电话贵不说，而且我们和同学白天在学校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要是晚上回家了还打电话，就没意思了，所以我们喜欢发短信。”

“我一般情况下尽量不打电话，有事就发短信，这样话费就少点，不然爸妈该说我经常打电话，净顾着玩不学习了。”

至于青少年之所以对于短信情有独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短信息的隐秘性。由于短信沟通方式采取的是通过非声音信号的文字来沟通，因此即便是同父母共同存在于一个空间中，子女也可以通过短信来完成同朋友、同学的沟通，也可以无形中通过文字构建一个相对隔离的场域。但是，由于短信息的可储存性，这样就增加了父母对于子女手机进行监管的可能性。因此，在笔者调查的几个中学生的手机中，并没有发现那种所谓的亲密短信。其中一个中学生告诉我说他们经常会及时地将手机中与同学或者有亲密关系的对象的短信删除，以防备父母对于手机的检查。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为何短息会受到这个群体的青睐。

至于短信之所以在这个学生群体中如此受欢迎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使用手机的空间的限制导致了短信的流行。学生平时多数时间都是在学校中，中国目前

多数的中学都还是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的。而由于社会治安、学生放学时间偏晚等一系列原因，家长在自己的子女使用手机方面与学校形成了一定的矛盾。多数使用手机的同学家长都认为现在社会治安比较差，自己的孩子放学比较晚，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给自己的子女配置了手机，主要的目的就是可以随时掌控孩子所处的地点和环境，安全成为家长首先考虑的因素。但是学校在考虑到学生管理、手机对于学生攀比心理的养成以及手机聊天和手机游戏对于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等诸多因素后，不赞成家长给孩子配备手机。处于这样的矛盾，就形成了目前存在于很多中学的学生在使用手机方面同学校、老师博弈的局面。据记者的报道人石赢讲述，他所在的班级目前就有一半以上的同学在使用手机，而且长时间同老师博弈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这些学生多数都学会了“盲发”短信的“功夫”。他们可以将手机放在书桌中，眼睛不看键盘发短信。这也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手机文化。

记者在调查社区中的青少年使用手机时也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有些中学生本身并不拥有手机，但是他们却在使用着手机，通过手机同自己的同龄群体（peer group）互动着。这也就是记者观察到的“借手机”和使用家长手机进行联络的现象。在记者调查的社区，有一部分的中学生由于家里的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家长对于手机给孩子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考虑，他们并不拥有手机。但是这些中学生并没有因此就与手机隔绝，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过使用家长的手机同自己的同学互通电话和短信的经历。他们说本身由于自己没有手机，就会在同学中或多或少地被排斥。我的一个访谈对象今年高三，家中的父母坚决反对在高中时，尤其是现在这个关键的阶段给他配置手机。因此他告诉我说班里的很多同学都有手机，而且现在他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地依靠手机，而自己却没有手机。他说有些时候自己的好朋友在节假日出去聚会和打篮球都用手机发短信联系，因此很多时候自己都不能参加，因此他感觉到渐渐地被同学疏远了。不过他说有些时候他还是会主动地用爸爸的手机给同学发短信，努力地维持自己对那个同龄群体的认同。

由于青少年处于受限制的境地，因此如果他们使用手机，就必然要正确认识到使用手机的成本及寻找到替代方式。刚刚提到的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联络就是一种替代策略，而另外一个适应的策略就是“借手机”。据记者的一个报道人讲

述，现在在他的同学里，借手机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他说因为同学中有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这些同学不只拥有一部手机，因此他们就会将闲置的手机借给自己的好朋友使用。而之前提到的预付话费的资费政策和目前低廉的话费给这个目前在中学生群体中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的政策支持。这些借手机的中学生不必考虑因为拖欠话费所带来的麻烦，也不必考虑对于他们来讲还是比较昂贵的手机购置费用。报道人石赢的学校准备召开秋季运动会，而身为班长的他要负责组织班级所有的活动，包括购买道具、联系出租遮阳棚、通知表演节目的同学彩排。他说平时还没觉得手机有什么大的用处，等到这样的时候就发现没有手机，不能马上联络到相关的人显得很不方便。因此他就从自己的同学那里借来一部手机，在运动会之前的准备阶段和开会期间统筹安排各项事宜。

对于青少年使用手机的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处不再赘述了，而且由于青少年应该说是所有使用手机的群体中最具活力的一个，他们对于手机的使用模式及由此产生的“青年文化”与其他的群体有着太多的异质性，这部分需要作专题性的研究，而且由于笔者的田野调查目前还处于进行的阶段，因此随着田野工作的深入会有更多的发现，日后会为读者呈现更加鲜活生动的场景。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手机在胜利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方便着他们的生活。但是笔者的一个观点就是手机这种新型通讯技术的进入并没有想象中的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沟通方式，社区内的人们是在利用这样的通讯手段继续维持着他们原有的生活，他们并没有利用这种新的通讯工具颠覆之前的生活，相反他们是在用手机来帮他们完成之前的生活中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们用手机维持并加强着之前的关系网，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父母们继续用手机监管着他们的子女，手机使得他们的监管力度有增无减，维系着中国自古以来的由上至下的家内伦理。手机所带给这些居民的是更多的“延伸性实现”。（Miller 2000）同时这样的使用模式也成就了手机的“技术本土化”，居民们通过使用手机同外界时刻保持着信息的互换，实现了自身以及家庭的“全球化”，他们不知不觉中被纳入到了全球化的范畴中。同样，他们也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将手机这个最具全球化特性的技术“本土化”了，完成了自身生活同这样的技术的互动。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技术的更加成熟和完善，

随着居民们对于手机的认同的逐步深入,无论是在胜利社区这个最普通不过的都市社区还是在其他地方,手机都将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惊喜。

Ling, R. (2004). *The Mobile Connection: The Cell Phone's Impact on Society*. San Francisco, Morgan Kaufmann

Heather A. Horst and Daniel Miller (2006). *The Cell Phone An Anthropolog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Berg

Fischer, C. (1992). *America Calli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elephone to 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iller, D. and D. Slater (2000).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Ling, R. and Yttri, B. (2002). 'Hyper-coordination via mobile phones in Norway', in J. E. Katz and M. Aakhus (eds), *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39-69.